



(Source: US DoD/ Lisa Ferdinando)

● 作者/Kori Schake and Peter D. Feaver等人 ● 譯者/黃文啟 ● 審者/馬浩翔

統帥與將領

美國軍文關係探討

Masters and Commanders: Are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Crisis?

取材/2021年9-10月美國外交事務雙月刊(*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2021)

文人領軍為美國軍文關係的核心價值，惟反恐戰爭迄今多次政治事件與決策，已引發外界對於如何維護如此重要價值的疑慮，本文係針對前文「美國文人領軍面臨的挑戰」提出不同的觀點。

現有流程仍運作正常

布魯克斯(Risa Brooks)、果畢(Jim Golby)及厄本(Heidi Urban)等三位專家對美國軍職領導階層提出多項嚴厲指控，認為美軍的影響力已經高漲到讓「總統憂心軍方反對其所提政策，且必須研擬一套能選擇執行行政當局指導的制度」。三人主張，「非經民選的軍方領袖會限制或營造文人的選項，俾利將領利用自己認定合適之方式行事」。同時「即便民選官員仍握有最後決定權，但假如將領主導所有選項或拖延選項的執行，民選官員則對其幾乎毫無實質控制能力——情況也往往都是如此」。三位作者針對相關問題提出的悲觀評估，導致其做出同樣悲觀的結論：「若文人無法有力監督軍方，美國無法維持民主制度及其全球霸權的日子就不遠了」。



假如美軍行事風格真如布魯克斯、果畢及厄本等人所言，那麼事實上已經嚴重違背人們所珍視的美國軍文關係準繩。然而，對美國民眾來說相當幸運的是，這些專家的陳述並非屬實。

就其中一項指控情況來看，這些作者虛妄描繪五角大廈文人領導階層的現有樣貌。雖然專家描述歐巴馬總統在討論阿富汗問題的過程中完全受到美軍將領蒙蔽，但美軍所持立場在當時確實得到美國國防部文人高層支持。歐巴馬總統的國防部長蓋茨(Robert Gates)和政策次長佛蘿妮(Michèle Flournoy)當時都深入參與研擬華府當局的阿富汗反叛亂戰略，並且在公開和跨部會論辯中堅定支持此戰略。就這方面來看，兩人立場與歐巴馬的某些顧問相左，諸如歐巴馬的國家安全顧問杜尼倫(Tom Donilon)及副總統拜登(Joe Biden)。換言之，此種意見分歧來自於美國國防部和白宮的立場相左，而非源於軍文對立。

布魯克斯、果畢和厄本亦宣稱，「軍事領袖往往都是直接將

擬議方案向國防部長提出，搶在文職幕僚給予建議與分析之前，迴避非軍職幕僚人員必須遵循的繁瑣安全查核程序」。然而，美國國防部長早已有工具來預防此種流程影響政策。例如，他可以在還沒看到文職官員的建議前，直接拒絕審查軍方的意見。雖然國防部長應該避免在尚未詢問其所屬文職幕僚意見之前作決定，必須為這個錯誤負責的是國防部長本人，而非軍方官員。而解決軍文失衡的最佳方式，是強化文職官員能力，而非削弱軍方。

個別來看，上述作者列舉用來證明文人領軍失能的多數例證——包含鮑爾(Colin Powell)擔任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時在擬定同性戀「不問、不說」政策所扮演角色，與高階軍職官員在抵抗川普總統要求阿富汗與敘利亞撤軍等作為——事實上卻是在發揮其應有功能的決策程序。跨部會體系正確賦予美軍充分影響力。雖然軍文關係在設計上就不平等，因為文人完全掌握決策權，軍方有權責在制定政策過程中貢獻自身專業意見。此種情況在軍隊和美國

大眾愈加分離的情況下更是如此。在1980年時，有20%美國人曾經服過兵役。到了2018年時，這個數字已經降到約7%。身為專業人員，軍方領袖在那些眾多文職官員缺乏專業知識的政策領域中扮演重要角色，諸如戰爭勝利的基本要件以及如何凝聚部隊向心力等。

不僅如此，軍隊在決策過程的影響力，係基於軍隊在文人領袖作出決定後，必定會恪遵並貫徹執行其命令的堅定信念。目前幾無任何證據顯示美軍在此角色上怠慢。雖然前述作者嚴厲指控「歐巴馬手下的將領暗示，他們只得接受在阿富汗採取積極反叛亂作為」，但這些將領在歐巴馬和川普任內確實接受較不積極的反叛亂行動。同時在拜登總統就任後，美軍也遵守行政當局命令，開始從阿富汗撤離所有美軍部隊。

布魯克斯、果畢和厄本也低估美國總統和行政部門以外文人監督管道的力量。因為美國國會也擁有同樣權限。觀察家有時會稱為「抗命」(Insubordination)的情形，往往發生在當立法部門強迫美軍必須揭露發



美國國會議員公開監督美軍戰備整備及國防政策推展進程。2021年6月23日，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及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密利(Mark Milley)上將，出席眾議院軍事委員會聽證會。(Source: US DoD/ Carlos Vazquez)

生在行政部門為免受其咎而所作所為的相關資訊。歐巴馬和川普總統抱怨美軍將領聯合同情美軍的國會議員表達訴求，使其在阿富汗問題上受到掣肘，這並非是美軍拒絕執行總統命令；而是美國總統不想為一個五角大廈軍職與文職領袖認為重要的決定付出政治代價。

美國國會議員向來會運用其監督權力以公開美軍觀點。例如在2003年2月，國會領袖強迫時任美陸軍參謀長的新關(Eric Shinseki)上將承認，華府當局想穩定美國入侵伊拉克後的情勢，還需要增派數十萬兵力——這遠超過國防部長倫斯斐所

核定的派遣人數。布魯克斯、果畢和厄本在文章中寫道，「國會同樣鮮少要求美軍服從文人當局，只會採取選擇性且基於黨派立場的算計作為」。但期待國會議員不這樣做無異緣木求魚。只要有利其政治算計，政客當然會利用軍方支持來達成其目的。

最後，讓人好奇的是，這些作者絕口不提美國軍文關係中影響最為重大的場合：亦即2020年「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議活動中，發生在拉法葉廣場的意外事件。6月1日，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密利(Mark Milley)上將著迷彩服和川普總統同



時亮相在一張海報上，時機緊接在警察使用催淚瓦斯和橡膠子彈驅離某個公共空間的和平抗議者。此事件似乎就是因為川普當局想要逼迫軍方鎮壓抗議群眾，派遣直升機去擾亂華府特區的遊行示威群眾，並且下令國民兵部隊占領多個美國大城市中心。毫不令人意外的是，在2021年2月的民調中，雷根總統基金會(Ronald Reagan Presidential Foundation)暨研究中心發現，美國民眾對美軍的支持度，從2018年到2021年下滑了14%。

較不受大眾注意卻對軍文關係極具關鍵的事情，是密利上將影響深遠的道歉之舉——此舉具體劃出了文人和軍事當局間的界線。密利直白地表達，「我不應出現在那裡。本人在彼時彼地出現，讓外界以為美軍干涉內政」。

最後，如同密利上將的作為明示，防止美軍政治化的唯一具體限制，就在其自身專業性。雖然在此領域有某些令人憂心的弱化現象，但期望美國社會嚴重政治化不會對來自社會的美軍官兵造成影響，是完全不

切實際的想法。美軍極具專業度的特質，就是軍隊內部的政治化現象仍然和過去同樣輕微。

布魯克斯、果畢和厄本所主張的軍文關係型態——軍隊在政策制定和執行上澈底服從文人指示——將會讓文職官員的判斷完全喪失有效制衡。美軍擁有運作空間，全然無法阻礙民選領袖決定和達成其政策偏好取向。那完全只須民選領袖付出公眾監督的政治代價。吾人應鼓勵負責行為，而非一味屈從。

一個風風雨雨但仍可維持的組合

有關美軍由文人領軍是否陷於危機的問題，在安全研究上早已是老調重彈。政治學家杭亭頓專論此主題的經典著作《軍人和國家》(*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問世已近65年，其內容論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軍文關係危機」。在越戰結束後，華府領袖爭論這場敗局究竟是文人領軍過度或不足。各方分析家在美國第一次波灣戰爭閃電取勝後，也提出不

同但卻相關主張，當時美軍地位和影響力強大，恰與政府文職機關咸認之失能狀況形成強烈對比。正因為有了這種其來有自的傳統，布魯克斯、果畢和厄本才會論定目前軍方官員和文人領袖的關係已然「瓦解」。

在此不禁要問，為何如此一直危殆的議題卻始終不曾惡化成軍事政變。布魯克斯、果畢和厄本等人表示，美軍文人領軍式微(他們回溯到1986年高尼法，當時設立一個有權力的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在此時此刻已然達到頂點。他們主張，文人領軍在今日甚至更加岌岌可危，且唯有採取激烈手段才能使其恢復正常。

然而，解讀美國軍文關係的較佳方式，應是一段風風雨雨但卻可持持續組合，有如夫妻倆無止境鬥嘴並爭逐上風，但卻從來不會摧毀彼此或破壞其共同關係。理論上，當然有可能離婚，但實際不然，所有相關人員都相當執著共同好處，而不會真正決裂。這些關係並非真正會面臨決裂，僅只是不斷磨合般時好時壞。

從此角度來看，實際上美國



2017年7月12日，時任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鄧福德(Joseph F. Dunford)上將於公開活動中，走上講臺向時任美國總統川普致意，此景與2020年，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密利上將與總統亮相在同一海報有異曲同工之妙。

(Source: US DoD/ Dominique Pineiro)

目前已達到軍文磨擦的一個階段高峰。此循環的頂點就是2021年1月6日，彼時美軍已經必須慎思其從未嚴肅思考的事情：亦即當失控的暴民占領國會山莊而可能破壞政權和平轉移。雖然此套制度在幾個關鍵場合中努力尋找立足點，也因為美國國防部領導階級絞盡腦汁思考，該如何回應來自國會

山莊的救援請求，然而如此關係卻從未接近崩潰狀態。

事後觀之，美國這套制度有幾個強大面相，讓文人領軍在川普政府執政時期能完好無損。高階軍方領袖所組成的團隊，尤其是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和各軍種首長，均致力維護文人當局。他們將所有目光完全集中在如何恪遵對美國憲

法的許諾，並承擔川普式個人崇拜而極化之政治環境及對其施加之壓力。另一群德高望重的退役高階將領則公開發言，挺身捍衛道德規範並協助軍方約束其所屬官兵。最後，在過去十年來，專業軍事教育體系致力重新強化教育軍文關係基本要件。

事實上，在後冷戰時期的整



整30年歷史中，此套制度運作良好的例證不可勝數——即便在某些軍方領袖不認同文人高層指導的情況下亦然。抗拒柯林頓總統改變軍職同性戀男女服役方式相關作為的體系，最終仍須落實歐巴馬總統終止「不問、不說」(Don's Ask, Don't Tell)政策的要求。美軍後來也恪遵川普總統推翻部分修改同類型命令，目前軍方亦執行拜登總統推翻前任部分項目決策。美軍也與文人領袖合作，處理歐巴馬總統大幅刪減國防預算作為，以及2013年擲節政策所加諸之某些更加擾亂現況的限制條件。軍方領袖雖然樂見川普執政期間放寬國防預算編列政策，但他們目前也準備迎接在拜登政府領導下截然不同的環境。然而，這都已經不是新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數十年間，文人高層和軍方官員一直都在類似棘手議題上相互角力。

話雖如此，軍文關係雙方領袖仍須持續強化彼此夥伴關係基礎。就此方面來說，布魯克斯、果畢和厄本等人的建議可以當作相當可靠之參考依據。

這些建議項目——包含強化國防部長辦公室文職官員、公開譴責違反專業規範的退役軍官，以及更新軍隊成員使用社群媒體的規範和最佳作法——都對常態恢復軍文關係極具重要性。

然而，這只是起步。川普任內作為，凸顯美國這套制度有多麼依賴尊重規範和禁忌。美國代議民主制度形式，賦予民選領袖、非民選政治任命官和職業文官極大權力。美國之所以能以功能正常之共和國立足，並非因為這些人缺乏權力來摧毀其憲政秩序，而是因為他們通常會選擇不去考驗其權限的最大程度。即便如此，當人民選出一名手上籌碼是玩弄規範及挑戰禁忌的總統時，軍文關係就會承受極大壓力。美國人民在近期內想恢復軍文關係正常體質，最佳作法就是貫徹那些規範並重申對遵守規範的承諾。不論在政府部門或其他地方的專業與通才之士，必須重新檢討美國文人領軍制度的運作方式，以及須實施那些作為來使其運作更具效率。

美國人民也必須清楚瞭解，

文人領軍並非良善政策的同義詞。雖然布魯克斯、果畢和厄本等人迴避提及如此混淆概念，但仍有部分學者很想將健全軍文關係的定義擴大到包含最佳地緣政治結果。這是一種可理解錯誤。軍隊存在的目的是為能確保國家安全，但假如一套制度不斷肇生讓國家更形危殆的政策，這套制度真的可被視為健全嗎？

或許並非如此，但美國人民不應該要求超出己身能力的文人領軍政策。文人領軍意味著民眾票選出之代表可以下達決定，包含其個人決定及希望授權他人下達之決定。但這並不意味著那些領袖一定會做出明智抉擇，甚或單憑運氣的決定。如同常見情形，宣稱因為美國干預阿富汗、伊拉克或利比亞才造成軍文關係陷於動態，絕對有誤。這幾場戰爭的每一項重大決策都曾經過激烈爭辯，但最後都由文人高層下達決心；包含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最初決定、侵略後計畫作為的選項、2007年急速增兵伊拉克、2009年同時對阿富汗短暫增兵並主動提出撤退時間表的



2021年1月6日，美國在總統大選後，不滿結果的抗議群眾攻擊國會大樓。(Source: Wikimedia Commons)

判斷、2011年出兵干預利比亞決議案、2011年完全撤出伊拉克，以及拜登總統最近將美軍完全撤出阿富汗的選擇。

川普政府拖延從阿富汗撤軍的決定，似乎最接近軍方所望選項超越總統想法的個案。即便在此案例中，文人領軍依然主導一切。假如川普真心堅決從阿富汗撤軍，他一定可以這麼做，如同其在2018年錯誤指導美軍放棄美國在敘利亞的庫德族盟友就是例證。只有在川普政府即將卸任幾天前——總統宣稱選舉舞弊的假消息，並且秘密要求少數效忠者倉促通過某些有害的國防政策——文人領軍制度才真正開始崩壞。但即便在當

時，川普拒絕依循正式指揮鏈的作法，卻讓軍方領袖得以拖延執行其決策。雖然如此反應可能在技術上違反文人領軍原則，但長遠來看卻諷刺地強化了未來文人的權力。

最後，各方領袖應投入更多精力在修正軍文關係的文人面向。就傳統上來說，分析家一直將主要重點放在軍隊自願服從民選官員。當然，各方領袖必須持續關注任何問題徵候。但一群自稱為「效忠美國將領」(Flag Officers 4 America)的退役軍方領袖，在2021年5月發表公開信質疑2020年總統選舉的合法性，卻正是軍隊道德標準式微的鐵證。退役高階軍官應該挺身駁斥此類事件，



而最高階現役領袖則必須提醒並告知所屬官兵，捍衛憲法意味著不應傳播有關正當憲政程序的假設息。高階軍官也應掌握所屬官兵心緒，尤其是那些中、低階官兵，以確定某些退役軍官表現的不專業行為，是否已對常備部隊官兵造成影響。

但文人領軍最脆弱也最需要加強的環節其實是文人自身。文人為主的每個部分都應予以強化。重要步驟包含教育那些位居跨部會流程最頂端的政務官、提供職業公務人員專業培養管道，以及各層級文官在行使軍事政策監督權立法程序時對文人領軍的認知。或許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各方領袖必須重視民眾對基本公民道德原則及基礎的瞭解程度，以促進健全軍文關係。沒錯，軍隊必須貫徹其義務並且澈底服從。但就長遠來看，真正決定共和國健全與否的關鍵仍在軍文關係的文人部分。

布魯克斯、果畢及厄本回應

謝克(Kori Schake)與費佛(Peter Feaver)兩人對瞭解美國軍文關係的論辯提供了有用參考背景。就目前來看，吾人同意當下並無迫切危機，也認同費佛所稱軍文關係間往往會有自然的對立現象。其論辯具有建設性，而雙方共識太強反而不利健全軍事政策的研擬。

即便如此，吾人仍然深信，過去30年來美國的文人領軍已經悄然且逐漸出現崩解現象。這些問題比謝克與費佛兩人所述更為嚴重且影響深遠。此種侵蝕現象是漸進且不斷累積的——是一個逐漸惡化的過程，而非單點崩潰。此種現象大體上

仍然隱而未顯，加諸大眾缺乏認知、美軍具有極高社會認同，以及兩黨極化對峙等現象，都阻礙有意義的改革作為。

如同謝克與費佛兩人在不同程度上提及，文人在損害軍隊超越黨派立場上扮演一定角色。例如，政客在利用服役經驗和象徵方面仍未受遏阻。在本文刊出後幾個月內，有關軍隊中立性事實上已經出現某些新質疑，某些政客甚至想把軍隊捲進美國文化戰爭中。2021年7月，阿肯色州共和黨參議員卡登(Tom Cotton)建議，高階軍官認為美國種族政治觀點，應列為晉升將官的檢驗項目，卡氏表示其「可能開始質問候選人」的觀點。只要美國政壇持續維持極端對立，兩黨政治人物就有可能利用軍隊來達成其政黨目的。

不僅如此，極化對立和負面黨派之爭並不限於民選代表。這些徵候也可以在美國大眾間明顯看出。由本文作者群中的果畢和費佛進行的調查研究中，可看出一個令人憂心的趨勢：選民愈來愈希望美軍在兩黨辯論時選邊站。此種分裂現象意味，即便美軍在行為上保持政治中立，但其所採取的任何行動都可能被解讀為支持某政黨。雖然吾人認同費佛所認定之軍文關係，可從重新恢復對公民教育的重視中獲得益處，但此舉可能仍不足以解決當前問題。要大眾不再視軍隊為黨派政治參與者，政治人物必須停止將軍隊捲入政治。

還有其他決策者可以且應該推動精進文人領軍的機會。在此方面，筆者極為同意費佛的論點。政務官事實上一定能從更多軍文議題教育中獲益，而文人公職應該予其更多機會來培養專業能力。一如謝克所言，加強文人領軍的方法之一是



政務官可透過議題交流，從文人參謀身上學習專業知識，瞭解各項重大政策的施政方針，圖為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圖中)與國防政策委員會委員，在五角大廈實施政策研討的情況。(Source: US DoD/ Zachary Wheeler)

「強化文人」。但此舉並不必然要削弱軍隊，相反地，吾人主張制度對稱性：諸如國防部長辦公室等組織，應該和聯參部門及聯戰司令部具有相同權能，而後者在近數十年來不論規模和影響力都有所提升。雖然五角大廈的文職幕僚人員未有下列命令的獨立權限，但今日若無這些人監督就絕對做不到有

效的文人領軍。

如同謝克所強調，從某些令人期待的跡象中，可以看出美國國會在其監督責任上已開始扮演更主動的角色。2021年6月時，國會議員投票廢止1991到2002年的《使用軍事力量授權法》，這個存在已久的決議案分別同意美國第一次和第二次對伊拉克發動戰爭的作為。國會

議員還推動立法，廢除有關由軍方指揮鏈決定是否起訴性侵害案的決策。兩黨對上述兩項措施的共同支持尤其令人感到鼓舞，因為這證明在某些具共識的領域中，國會可再度確保文人領軍。

重新確保文人領軍也有軍隊必須扮演的角色——雖然謝克宣稱此方面並未有任何問題存



在。問卷調查顯示，有相當比例的軍官認為他們在作戰和戰術層級事務上應有獨立自主權。當決策者所設下的時限或部隊人數限制不符軍官期待時，某些軍官會不把這些指示放在心上。此種態度必須加以改變。高階軍官必須誠實建議文人領袖，某些政治決策可能帶來軍事後果，但他們不能——也不應該——決定結果。

謝克甚至認為五角大廈現行決策流程並未有任何問題，此流程往往讓軍事領袖可以獲得超越文人領袖的官僚體系優勢。謝克強調美國國防部長擁有特權，能要求文職幕僚提供建議。但吾人重點在於這套制度並未自動發揮其應有功能。除非文職幕僚監督決策成為常態，否則軍方往往會阻撓政策。

許多資料也發現軍官對於超然黨派的政治重要性認知正在減弱。雖然多數軍官仍然恪遵規則並避免捲入政治爭辯，但此問題依然存在。費佛引述部分退役將官發表公開信的例子，尤其是其中一封更是嚴重——這都是因為過去30年來，美軍一直對退役軍官為政黨背書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所造成的結果。雖然沒有任何現役軍方領袖參與其中，但意義也不大：研究顯示大眾多半會將現役和退役軍人等齊視之。

確實，對於美國總統的決定並沒有發生任何公開抗命舉動。就這方面來看，文人領軍確實維持完好。但仍然有部分作為是透過爭議手段來左右相關決策，謝克卻並非作如是想。以2009年美國對阿富汗大量增兵為例，謝克並沒有說錯，當時文人國防領袖支持軍職首腦，採取充分滿足資源的反叛亂作為，時任國務卿的希拉蕊亦是如此。

但強調某些文職官員同意軍方立場，或由歐巴馬總統下達最終決定並非吾人所強調的重點。雖然某些文職官員同意軍方建議。但一般獲得參謀首長和聯戰司令部司令支持的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必須準備符合總統指示的「軍事分析、選項和計畫」。由2009年增兵案討論內容中所公開的紀錄顯示，軍方領袖為了某些特定政策選項，刻意拖延歐巴馬要求的某些重要面向，包含一套嚴謹的反恐提案。軍方的說法為相關方案無法立即策擬或完成，讓某些備選方案根本上不了檯面。那並非是一個按原有設計而運作的決策流程。

還有部分證據顯示，軍方領袖竭盡全力提高歐巴馬在拒絕後所須付出的政治代價，即便他們當時實際上並非作如是想。據記者伍德渥德(Bob Woodward)表示，時任中央司令部司令裴卓斯(David Petraeus)上將，在《華盛頓郵報》刊登一篇對增兵案提出質疑的評論意見，找來該報一名支持他的記者，並暗示這位記者應撰文反駁這個意見。美軍及國際部隊駐阿富汗司令馬克里斯多(Stanley McChrystal)，在英國某個智庫向聽眾直率表示，他無法接受完全以反恐為重點的阿富汗任務。而一份由馬克里斯多上將草擬要求大規模增兵的報告外洩——當時國防部長蓋茨認為是馬克里斯多辦公室刻意洩露。如同費佛本人當年發表的文章所述：「此次洩密事件讓歐巴馬總統更難拒絕馬克里斯多上將的增兵要求，因為該項評估有其明確依據」。

就此方面來看，歐巴馬在備忘錄中針對此事的回顧值得再看一次：



美國國民兵部隊受命協助聯邦機關及州政府，遂行第59任正副總統就職典禮前，國會大廈周邊地區安全維護任務，這是軍人捍衛文人領軍的最佳寫照。(Source: US Air National Guard/ Lucretia Cunningham)

雖然謝克可能會認為，軍隊應該扮演「文職官員判斷的有意義制衡力量」，但我們並不認同此種觀點。美國政府制度體制面上的制衡力量應該來自國會、法院和行政部門，而非穿制服的軍隊——無論軍隊經驗多豐富、專業多強擅或知識多淵博。

最終，有關軍文關係的不變問題就是——這是不是危機？其偏離真正論辯，迫使人們選擇捍衛其中一個極端，卻犧牲了解決另一個遠遠更複雜現實條件的機會。文人領軍有其程度差異——並非絕對條件。將重點放在軍事政變或軍方公然抗命，全然缺乏建設性。這將使大眾更難瞭解問題存在，也更難透過其民選代表推動改革。

一如謝克與費佛，吾人深感欣慰，美軍能承擔川普總統任期內的政治動盪，並挺住2021年1月6日川普煽動民眾攻擊國會山莊的試煉。但重要的軍文規範受到侵蝕，卻早在川普之前就已存在，絕不會因為川普離開白宮就瞬間消失。美國可以更好，而美國人民也應要求對於社會、民選領袖和對美軍來說更好的美國。

作者簡介

Kori Schake現任美國企業研究所外交暨國防政策研究主任。過去曾在老布希總統任內擔任國安會及國務院幕僚。

Peter D. Feaver現任杜克大學政治學暨公共政策教授。曾於1993至1994和2005至2007擔任美國國安會幕僚。

Copyright © 2022,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ublisher of *Foreign Affairs*, distributed by Tribune Content Agency, LLC.